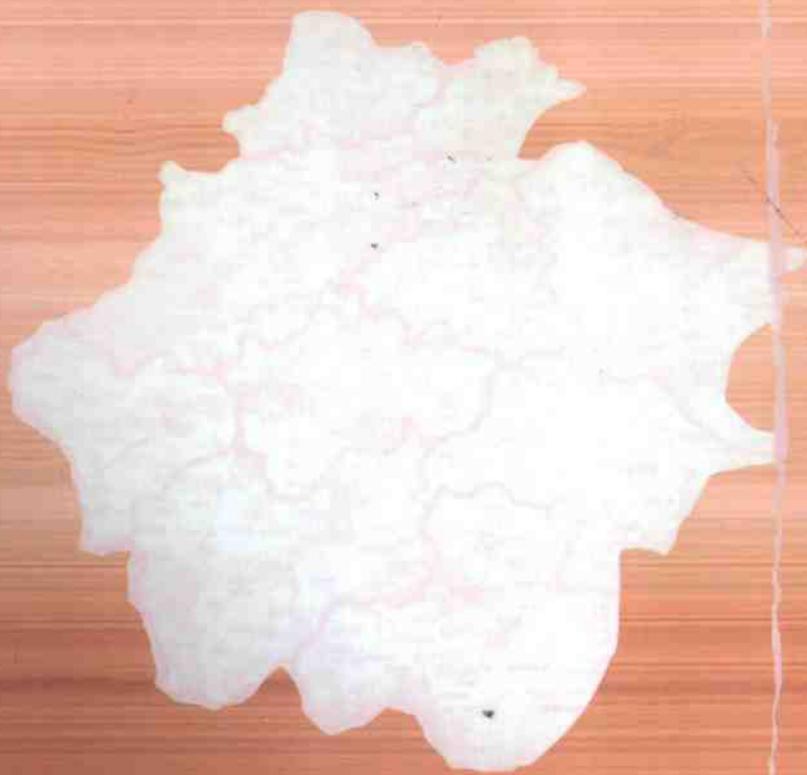


扫描浙江

• 5 •

柴国荣 主编



SAOMIAOZHEJIANG

SAOMIAOZHEJIANG

扫 描 浙 江

目 录

聚焦浙江

为什么会有台州现象？	
——解读台州现象之一	1
一个协助增进的政府案例	
——解读台州现象之二	6
产业集群的台州经验	
——解读台州现象之三	11
台州产业升级进入快车道	
——解读台州现象之四	15
从“第三世界”到“民营示范”	
——解读台州现象之五	19
启动新一轮产权革命	
——解读台州现象之六	23
“三个台州”:拉动台州经济再腾飞	
——解读台州现象之七	28
那些活跃的“尤努斯”们	
——解读台州现象之八	33
从“草根经济”到“草根民主”	
——解读台州现象之九	39
台州现象的文化种子	
——解读台州现象之十	44
台州模式:草根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典范	49
未来五年浙江新政两大主题——	
加快科学发展 全面改善民生	51

关注民生贯穿城市更新过程	
城市有机更新的“杭州模式”(上)	53
寻求名城保护与更新“双赢”	
城市有机更新的“杭州模式”(下)	56
浙江:如何完成从5千到1万美元的跳跃	58
浙江公路的新标杆:品质型公路	61
平安型公路:浙江公路人献上的和谐大礼	66
生态型公路:浙江公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69
服务型公路:突显浙江公路人的奉献情杯	73
阳光型公路:一切让人民群众称心满意	77
“五型公路”:浙江公路又好又快发展的载体	
——访浙江省交通厅副厅长、公路管理局局长李良福	80
奇迹,在这片热土上迭出	
——来自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报告(上)	82
希望,从这座新城升起	
——来自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报告(下)	87
浙江经济两极分化 刘易斯拐点初现	91
钱塘江:生态与经济孰重	94
杭州地铁工地事故的三个“为什么”	97
本土动漫行业现状堪忧	101
资本抱团应对“最困难一年” 首批浙商明日之星出台	104
宁波新角色:构筑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开放宁波”系列报道(一)	106
宁波寻求新模式开放型经济大转型	
“开放宁波”系列报道(二)	110
提升服务:宁波营造新优势	
“开放宁波”系列报道(三)	114
宁波:从“开放立市”转向“开放强市”	
“开放宁波”系列报道(四)	117

浙江大地

宁波:让外来务工者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访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胜隽	119
“社保套餐”让农民工感到幸福	122
和谐促进社会促和谐	124
率先实现由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的蜕变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发展的报告(上)	127
大力集聚创新要素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发展的报告(中)	130
精心打造创新孵化器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发展的报告(下)	133
温州开发区缘何“零负债”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系列报道之一	136
民外合璧:开发区招商的“温州模式”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系列报道之二	139
温州开发区:严把项目环评关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系列报道之三	142
“新温州人”的权益“保险阀”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系列报道之四	144
留地安置:给农民留下“生蛋的鸡”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系列报道之五	146
“临安模式”如何达到医、采、管共赢?	148
“钱江潮”文化	152
宁波、嘉兴迎来大桥经济时代	154
生态文明:丽水发展新引擎	157
余杭内开地法治量化评优先河	159
宁波申遗“盘算” ——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暨西湖申遗纪行	161
实业寒冬 温州资本试水金融江湖	163

绍兴袍江:以创新促提升蔚然成风	166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依旧	168
清洁养殖的“南湖模式”	171
五大工程相继开放“品质杭州”又显新面貌	173
嘉兴产业集聚式创业模式引关注	174
杭州“救市”效果未显现观望情绪难解	176
宁波:农民工与企业一起“过冬”	180
千里渐台一日还	182
杭州今年新财力三分之二用于民生	184
差异化发展赶超同行	
——嘉兴秀洲区提升纺织业(上)	185
资源驱动转为创新驱动	
——嘉兴秀洲区提升纺织业(下)	187
杭州楼市陷入“阶段性”低迷	189
忙碌的皮革时尚代言人	
——海宁中国皮革城系列报道之一	191
国际化成就中国皮革第一桥头堡	
——海宁中国皮革城系列报道之二	193
打造中国皮革业 CBD	
——海宁中国皮革城系列报道之三	195
不“疲”的皮博会	
——海宁中国皮革城系列报道之四	197
用文化“鞣制”皮革时尚	
——海宁中国皮革城系列报道之五	199
一家浙企的财务报表:净利润降 221%	201
制造业高成本时代来临 民企被据转型	
——浙江民企财务状况调查根源	204
求生路 民企开源与节流并举	
——浙江民企财务状况调查之化解	207
舟山海域大批内河船搞海运隐患重重	209

企业之旅

浙江富润:踏上金融行业的跳板?	211
唐狮选秀:传统产业的互联网盛宴	214

宏观论坛

让“天堂”杭州成为“生活品质之城”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谈“民生”	215
全面措升宁波对外开放水平	219
优化环境才能提升竞争力	
——访浙江省嘉兴市委书记陈德荣	223
发展城市群,建设大金华	
——访浙江省金华市市长陈昆忠	225
“两个率先”提升浙江水利战略地位	
——访浙江省水利厅厅长陈川	227
建设生态文明:浙江要继续领跑	
——访浙江省环保局局长徐震	230
台州路桥区三次产业奏响县域发展主旋律	233
温州企业坐等转机不如转型自救	240

浙人风采

告别“压缩饼干” 走“类型”道路

——记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叶鉴铭和他的职教理念与办学思想	242
田宁:网络新贵正年轻	247
80年代我就曾放开农民户籍	
——温州民营经济口述实录	249
被定“投机倒把罪”,我在外逃了2年	
——温州民营经济口述实录	253
后记	256

为什么会有台州现象？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来，台州市经济社会领域，尤其是工业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理论界称之为“台州现象”。前不久，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中国志”报道组深入台州，对台州现象进行了调查解读。从今日起，本报将陆续刊登这些报道。

■解读台州现象之一 ■本报台州报道组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省台州市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荒僻的海防前线，如今已成为制造业基地，在八百公里海岸线上，分布着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制造业集群。从这里下线的产品，走向了全国，走向了140多个国家。据统计，台州已有28个工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全国第一。不少产品及规模甚至做到了世界第一。1978年以来，台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9.5%，高于全国和浙江的年均增长速度（表1）。30年来，这里还出现了若干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和政治突破，比如股份合作制、民营银行、党代会常任制、民主恳谈和参与式预算改革等。

台州现象化解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是一种兼具两者之长的区域发展路径。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不同地区，探索出了诸多各具特点的发展模式，其中，尤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最受瞩目。前者被称作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后者则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诱致性变迁。这两种模式可以说是我国地区转型和发展的基本模式，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各地借鉴、学习的对象。

但是，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地方改革和发展路径出现了新的变化。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的差异显得不那么明显了。实地深入观察台州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和发展路径，我们发现，上述两种似乎对立的区域转型和发展模式，在这里已经被化解了。当然，台州在地理上更接近温州，在改革起点上两者更为近似，本报2002年曾经提出过“温台模式”，其含义就是说，温州和台州的发展路径，是同源的。这一判断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现在看来，这个概括已

经不够全面了。在此次采访中,我们注意到,伴随着台州成为长三角区域合作体系中的一员,台州向苏南模式接近的步子加快了,意识上更自觉了。而这样的转变过程进行得十分平滑、顺利,说明台州本土内部早已存在着趋近的基因。我们将兼具两种模式之长的转型和发展路径,以及由此取得的经济成就,称作台州现象。

台州现象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经济发展的民本性质,即民有、民营和民享。

改革开放之初的台州,是区位偏僻、资源匮乏、人民贫穷的地方。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本,也非常短缺,当时人均银行存款不到八分钱。台州的经济实力在浙江位居倒数第二位,政府财政收入 1.2 亿元。由于是海防前线,国家的投资很少。改革开放之后,台州也不像珠海、深圳、厦门等地,享有政策优惠。这一切都说明,在改革的起点上,台州处于劣势。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国家政策的松动,在这里诱发出了巨大的发展动能,来自民间的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热情,冲破了外在的种种约束和政策限制,走上了民间体制创新之路,通过来自人民的体制创新,不仅克服了诸多不利条件,而且还获得了“先发优势”。

台州的经济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些民营企业最初几乎都是农民创办的。面对资源、技术、资金、人才和政策的约束,这些刚刚从田地里走出来的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首先,创造了股份合作制这样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最初,它的名字叫“社员联营”,表面上属于集体企业,而实际上则是一种合股经营的民办企业。这种戴着“红帽子”的民营企业,很快就在台州推广开来,引发了工业化的第一波浪潮。到 1988 年,这类企业已经达到 9000 多家,到 1994 年达到 76790 家。其次,创造了一系列民间资本融通形式,这种集聚资本的方式在资金短缺的工业化初期、在国有银行体系贷款不足的情况下,使资本原始积累成为可能。台州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资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民间的个人资金。民间资金不仅被集聚起来创办企业,而且还进入到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比如水利、道路等公共设施等。据统计,从 1986 年至 2003 年,台州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29 亿元,其中民间资本达 1500 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80% 左右。由此可见,台州经济具有民有、民营的特点。与此相连的是,台州实现了让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目标。根据一项统计,台州平均每 20 个人就有一家工业企业,另外还有 25 万个个体工商户。差不多家家有企业,这一现实说明了,绝大多数台州人实现了发展机遇的共享、发展成果的共享。在长三角 16 个城市中,台州地区生产总值位居中间,但是人均收入却名列前茅。

因此我们说,台州经济本质上是民本经济,即民有、民营和民享。这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好的市场经济,不是少数人得益的经济,不是权贵主导的经济,应当是民本经济。

台州现象的基本特点之二是地方政府在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中对全国性政策进行了创新性运用

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试验主义的性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启动的改革,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地方,都是被困境或饥饿逼出来的,带有“救亡图存”的紧迫感。改革之初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和总体目标,而是在计划体制内引入一些市场的因素,比如在生产资料计划价格之外引入了市场价格,形成了双轨制;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私营经济适度发展,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局面。

双轨制的政策选择诱发了民间的致富冲动。面对被政策诱导出的民间创新,地方政府如何反应是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和路径的关键因素。由于改革的总目标是逐渐明确起来的,由于旧的体制、政策仍然存在,在面对民间创新的时候,主政的台州地方政府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措施,对民间创新持宽容的态度,允许试验,对各种新做法,不急于封杀而是先看一看再说。事实证明,正是采取了这样开明的态度,台州才获得了先发优势,才形成了民间“创新集群”。这些创新包括联户经营、股份合作、生产资料市场、民间资本市场,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改革,也包括大量的企业行为。在台州地方政府的默许、庇护之下,这里出现了我国第一份支持股份合作制的文件,这里最早进行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里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民办学校、民营医院和民办银行。台州很多产业是国家管制性的行业,如医药化工,汽车摩托等,它们在政府的庇护下,发展了起来。

吉利是我国唯一一家民办自主品牌汽车生产商,如今被认为是我国民族汽车工业的骄傲。但是,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初,却面临着管制壁垒。1999年,虽然吉利汽车已经开始进入商业化批量生产,但直到2001年4月份,李书福还在为进入国家的汽车目录而四处奔走。在看似“非法”的情况下,台州地方政府始终据理力争,以“发展之后逐步联合”、“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竞争”等理由加以庇护。如果这个时候台州地方政府不是庇护,不是据理力争,那么吉利很可能就死在摇篮里了。

台州的经济奇迹是诱致性和内源性的。台州地方政府也确实很少创办国有企业。有人据此认为,台州地方政府是“无为而治”。这是一种误解。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不存在无为而治的地方政府。“无为”不过是用力的重点、方向不同而已,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选择向什么方向用力的空间。相对于其他

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积极角色,台州市政府的作为需要冒更大的风险,需要更高的艺术。地方政府处于国家总的政策与民间创新活动中间,它需要时时权衡,对于各种试验,既不能违反国家政策盲目地鼓励,也不能简单地封杀,而是需要做出判断,对于合情合理、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方向的做法,先庇护起来,看一看再说。

台州现象的基本特点之三是激励企业家成长

台州拥有 10 万多家企业,形成了 30 多个产业集群。而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是这些企业的灵魂人物——企业家。本报记者多次到台州采访,每一次都震惊于一个现象,那就是台州拥有如此丰富的企业家资源,据说,平均每 3 户家庭就经营着一个企业或是一个个体户,几乎每个台州人都想自己办企业。这些不安于现状的台州人,将各种要素组合起来,建立企业,走南闯北,开辟疆土。

台州民间丰富的创新精神,是企业家成长的土壤。而企业家则是民间创新精神的代表。企业家的最大特征是敢于冒险,勇于创新。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开辟新市场,寻找新的原料来源和企业组织创新。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下就不难发现,台州本土具有这种品格的企业家比比皆是。知名的如飞跃的丘继宝、吉利的李书福、苏泊尔的苏显泽等。这些来自民间的企业领袖成了台州经济增长的栋梁。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着精彩的成长故事。这些企业家的成长经历说明,企业家的出现不是天生的,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政府和社会的正确激励来到人间的。如果说台州的企业家特别多,那一定是这里的政府做对了激励,这里的环境适合企业家生存。

台州现象的基本特点之四是善于向其他模式学习

台州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路径,在基础层面,与温州很类似,比如都以民营经济为主,都拥有众多的专业分工的市场,其发展都依赖民间资金的积累,很少有国家投资,也就是说都是内源性的,是诱致性变迁的典型。

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最近几年,台州与温州的差异开始显现,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台州拥有更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而且在产业高级化方面,台州进展较快。台州重视国际产业转移提供的新机遇,积极地融入长三角产业分工体系。这一新的趋势使台州偏离了旧的模式,具备了苏南模式的一些特征,例如大的国有资本落户台州,政府主导的产业调整等。

这种兼容性构成了台州现象的内涵。实际上,台州很早就提出过这样的口号。1987 年,当时的台州地委根据形势提出了“取两南(苏南和浙南)之

长”,走自己的路,大力发展战略合作经济的战略。今年以来,台州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分析形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时,台州意识到这与民营经济的草根性和脆弱性有关,意识到国有经济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方面明显优于民营经济,因此有必要学习其他体制的长处,学习江苏“三条腿走路”的经验,坚持国资、外资、民资一起上。

台州现象诠释了什么是思想解放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第30个年头。人们在总结、阐释中国奇迹的时候注意到,思想解放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观察和分析台州现象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台州在起点劣势的情况下创造的转型和发展奇迹,是用实践诠释了什么是思想解放。所谓思想解放,最根本的就是对创新、对实践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的尊重,就是对各种创新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试,允许闯。台州现象说明,民间蕴涵着巨大的、无限的创新动能,只要有一点缝隙,就会诱发大量的创新行为,这种行为与地方政府塑造的包容文化氛围结合起来,便能克服各种障碍,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在离开台州的那一天,本报记者专程来到海边。这里正在围海造地。台州市委书记张鸿铭向记者展望了台州的未来景象:在海上,将兴起一个新的台州。一个集聚着巨大生产能力的沿海产业带已经崛起。这景象或许正是台州现象的缩影:只要拥有海一样的胸怀,再恶劣的条件,也无法阻挡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动。这一启示说明,台州现象对于我国的发展和转型具有一般性意义。

(本报台州报道组成员:本报记者 张剑荆 柴国荣 夏金彪 徐伟
张帆 邹建锋 汪海宝 本文执笔张剑荆)

(载于2008年11月5日)

一个协助增进的政府案例

■解读台州现象之二 ■本报台州报道组

一个来自北方的处级干部在台州“学习”一番后，不无“同情”地向陪同他的台州官员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这官儿当的，也太不像个官儿了。

然而，这就是台州，一个以“民间为主导”，政府主动退居其次，充当“配角”的特殊案例。

从消极有为到积极有为

山海文化锻造的台州精神，让台州人总是敢去干那些从来没有干过、甚至是过去不允许干的事情。然而在1992年前，台州人每走出一步，几乎都伴随着外界的质疑、指责、批评。

面对民间自发而生的巨大经济活力与国家旧体制之间的明显冲突，台州地方政府被硬生生地夹在了中间，既不可能违背国家的方针政策，又不愿意扼杀群众的创业激情。于是，在草根经济发展的初期，台州地方政府更多地充当了一个貌似“无为而治”的角色，在二者间玩起“太极拳”，对认为合情合理，符合改革方向的创新现象进行庇护和许可。

上世纪80年代初，台州一些人走出家门闯天下，面对数以十万人计的人无组织外出，习惯了“车马归田、劳力归队”的一些人大惊：“这还了得”。当时的台州地委、行署领导则认为，台州人多地少，群众要寻找出路，这是发展经济的积极表现，是好事，应该鼓励。于是当时的台州行署特地发文，鼓励群众走出家门务工经商。“要想富，外出做工卖豆腐”成为当时响遍台州农村的口号。几十万台州人出外打工、补鞋、卖豆腐。在台州经济发展史上，这成为释放民间活力的重要一步。

改革开放前，台州的市场被当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土壤”，有的地方连农民卖个鸡蛋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在众多的“不准”和“限制”之下，公开合法的市场越来越少，而群众自发形成的“地下市场”、“黑市交易”却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之初，当上级还没有明确这些市场的性质时，台州就恢复开放了209处集市贸易点，恢复了367个集贸市场，年成交额达1.566亿元。1983年，路桥形成了影响全国的废旧钢铁市场，当时上级许多部门都指责这个市场“影响国家物资计划”、“违反国家政策”、“扰乱市场秩序”，强烈要

求关闭、取缔这个市场。当时台州交通极为不便,这种到全国各地去收购,千里迢迢运回来拆解的行当能干多久,大多数人心里都是问号。但台州地委、政府通过调研,发现这个市场的出现,不仅使一批群众从中获利,而且提供了大量市场上买不到的重要原料,有力地支持了台州的民营企业,于是决定“让老百姓再试一试”。当地政府的这一坚持,使这一行业不但没有被取缔、封杀,反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台州既没有优惠政策和区位条件可以像深圳、广东那样大张旗鼓地引进外资,也没有财力可以像江苏等地那样由地方政府直接投资办企业、上项目,而几乎全都是民办企业、民办市场、民办学校、民办金融。在很多人的眼中,台州地方政府几乎是无所作为,只能听任群众干这干那。然而事实上,这个时期政府更多进行的工作是默许与变通、认可与鼓励。通过“消极有为”解决了个私经济的生存危机,通过“积极有为”主动制定并运用种种政策手段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切作为的背后,是当地政府对民间力量的尊重,以及对政治风险的勇于承担。

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与旧体制的搏杀之后,一直以“放”为主的台州政府发现,随着全国各地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深化,台州机制灵活的优势减弱,而股份合作制作为不成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劣势逐渐显现;过去政府为改变落后的区域经济面貌而放手群众干的勇气在弱化,代之的是较其他区域还要僵化的管理;台州过去拥有的创业人才优势如今成了极易被拉走的企业主的劣势;民间力量勃发的优势,却使区域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紧迫感减弱。同时,民间推动的模式,导致经济发展“散小低”,产品以国内市场为主,科技管理人才稀缺,政府管理以“放”为主,社会法治程度不高,开放程度不足。

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开始深刻影响台州的建设和发展。正在发展快车道上行走的台州骤然放慢了脚步,审视周围的一切:土地等要素资源四处告急,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之下,粗放型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经济固有的素质性、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显露。

面对现实,台州发现,政府一味扮演“放任者”的角色已经远远不够,必须在一些大的战略、大的产业布局上发挥自己引领与调控的作用。

升格为“服务提供商”

在悬挂有“上善若水”条幅的办公室里,台州市委书记张鸿铭向记者阐述了他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之道。

2004年,台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把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作为大工业的重中之重,以此构建科技、人才、金融等全方位的大工业服务体系。《工业30条》、《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扶持五大主导产业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相继出台,加快沿海产业带建设,以财政贴息等方式加大工业扶持力度。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还连续几年开展了工业服务年和项目推进年活动。在“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规划中,汽车行业排在了首位。台州市在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资金中专门切出一块汽车行业资金,优先考虑扶持汽车产业,同时,在土地、用电、规费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倾斜。吉奥不是一个神奇小子单独创造的奇迹,“政府对汽车业,对吉奥或者吉利的支持是台州人尽皆知的事实。”当地一位官员说。

时间到了2007年下半年,此时,台州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愈显迫切,要素资源紧缺特别是用地空间不足更加严峻,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台州市委在认真总结全市“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台州”战略,通过“节约”、“集约”、“创新”、“统筹”、“可持续”,实现“陆海联动”与“内外互动”,建设一个内陆“好”台州、一个海上“新”台州以及一个疆域无形的“大”台州。

除战略部署,政府开始做一些更加具体的事情。

比如特色产业园区的建设,以前老百姓做阀门生意搭个棚子就开张,后来政府专门建了个大园区,把相关的物流企业、科研单位都请进来,大大提升了企业形象,对于人才的吸引、品牌的建设大有好处,把以前无序、家庭作坊式的行业做成了一个大产业。长期以来,台州政府对招商引资、引进项目这样的事不是很感兴趣。然而,现在政府想清楚了,应该积极作为,主动引进一些对调整提升地方产业结构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政府的思路也变大了:从以前一味强调企业规模化发展,变成以技术为导向进步;从以前一乡一品的块状经济中跳出来,转而为打造国际性创新型产业集群服务。因为他们看到,外向型产业往往在国内更有竞争力,而只针对国内的产业集群却往往要不了几年就停滞消逝。

政府的思路也更务实了,从以前动辄强调向国际开放,转而调整优化官员考核制度,推进台州市内区域间的开放,推进县与县之间的项目合作,推进台州与其他兄弟地市之间的合作。而为了推动台州企业的科技进步、从模仿走向创造,台州还特地申请成为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城市。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台州地区,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服务对象群体。如何对待这个群体,张鸿铭说,台州政府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为企业减负,创造

一个低成本政府。为此,台州大力抓好政府各职能部门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减少审批项目,一个窗口办事,变串联式为并联式。近年来,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还不断创新出“绿色通道”制度、全程代理联络员制度/全程为民办事代理制度、现场踏勘联审制度、告知承诺制度、重大项目办理挂牌销号制度、预约登记办理制度、重大投资项目预联审制度等。

在张鸿铭书记这里,记者还得悉一次新的产权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今年开始,台州提出了民企股权重构战略。用三年时间将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由目前的一股独大,改制成为现代公司制企业。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要载体、以稀释私有股权为主要目标,以引入产业资本、产业投资基金、战略投资者为主要手段,达到治理结构完善的目标,并最终走向资本市场。

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分析说,一股独大的情况越少,台州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就越高。

政府官员当“高管”

* 1985年,浙江台州黄岩一对普通的夫妇靠3万元借款,创办了一个生产橘子香精小作坊。2007年,昔日的小作坊已发展成为外向型的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江苏、黄岩等地设立了四家控股子公司。企业主要从事高级精细化工产品中间体的产销业务,年销售额达9亿元,60%以上产品销往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际市场,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之列。

联化科技的发展完整演绎了典型的台州民企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嬗变历程。

创业之初公司的3万元注册资本完全是个人的,与政府无关,但是鉴于当年的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要求企业必须是乡镇企业,联化科技得到地方政府帮助,顺利“挂靠”成了乡镇企业。

1992年企业因发展需要引入人才。那时整个国家的人才流动环境,完全不像现在这样宽松。台州市政府出台政策,规定引进的人才到台州后,可保持原户籍、原干部身份,同时可在台州进行职称评定。于是现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就放心地从上海一家国有企业来到了台州。

现在,政府除了鼓励企业创品牌、进行技术创新、去国外参加各种展会活动外,还鼓励企业采取环保减排措施,对进行环保治理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同时政府还会返还技改项目资金的3%—5%,以提高企业技改的积极性。联化科技被台州市政府列为了“513工程”骨干企业,即帮助企业上市,走资本扩张路子。还引导企业进一步融入新的开放大潮,把企业窗口设到上海,集聚人

才、信息和技术,和“台州制造”实现联动;同时还引导企业到海外打包并购企业,吸纳先进的技术、管理、设备、品牌,打造“新台州制造”。

在台州,像联化科技这样受惠于政府的企业数不胜数。

台州市委政研室主任郑楚森说,台州现象之所以出现,正是企业、政府两种力量相互博弈、相互促进的结果。促进而不干预,正是台州政府的成功之处。政府没有去做企业应该做的事情,更没有给企业“包办代替”,做的都是政府管理职能范围内的事情,所采取的策略都是通过公共产品(包括政策、基础设施、服务等)的供给来引导和推动企业的发展,在方向上给予引导而在办法上实施推动,推动企业去想办法,而不是直接介入或干预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以及技术研发活动。

如今,台州的官员们更多是在做一种高智商的工作。玉环一家企业想与全球最大的齿轮企业合资,政府便主动出面,帮助企业分析利弊,细致到究竟应该是改制重组上市后出让,还是先合资再上市收益大。

张锐敏说,今后政府还需要给企业更多的帮助。他认为,政府就应该充当一个大公司高管的角色,筹谋当地资源如何配置、运筹。

而为了当好这个高管,台州的官员们都自称为学习型官员。一个典型表现是,在市委、市政府大楼里,就开有一家新华书店。而到了各个部门的办公室,摆着放着的到处都是书。而谈起话来,几乎每个官员都能自成体系地讲出一番理论与实践来。

培训不光是针对官员,张鸿铭对记者说,企业家是台州真正的宝贵资源,为了提升企业家的素质,台州市政府设立了“民营企业家培训基金”,年初列入财政预算,纳入市“人才专项经费”管理使用。辖区内的各县(市、区)也按一定的比例设立了民营企业家培训基金。每年台州都会组织全市优秀企业家及优秀企业家后备人员“走出去学习”活动。

玉宏房地产集团董事长周洪丽曾经到中部某省投资房地产,两相政府对比,她这样评价:台州政府是“不承诺、不反对”,这远胜于有些地方政府“承诺但不兑现”。

浙商的务实、精明、讲信用也沿袭到了政府官员的身上。也可能正因此,才让台州的官员看起来更不像官员。

(本报台州报道组成员 张剑荆 柴国荣 夏金彪 徐伟 张帆
邹建锋 汪海宝 实习生 叶瑜 本文执笔张帆)

(载于2008年11月6日)